

# 侵略朝鮮與呂宋貿易—— 十六世紀末加藤清正的唐船派遣計劃

中島樂章 (九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

十六世紀末日本與東亞各地的海上貿易實際狀況，除葡萄牙人留下豐富記錄的澳門—長崎貿易外，因受史料限制，不甚清楚。由於這一時期航海來日本的華人海商為犯明朝禁令的走私者，所以描述其活動的史料匱乏，並且記錄日本海商和大名開展的海外貿易實際狀況的史料也非常稀少。在此狀況中，關於肥後（現為熊本縣）北部的領主加藤清正正在侵略朝鮮過程中派遣「唐船」的一系列文書成為有關十六世紀末九州大名開展海外貿易的珍稀史料。這些文書曾由森山恆雄先生介紹，並進行了詳盡分析，但關於此「唐船」的航行目的地與進口貨物等尚有諸多不明之處。在本報告中，同時參考明朝與歐州的史料，重新檢討一系列文書，嘗試考察其實際狀況。

## 一 有關一五九三年十二月，加藤清正唐船派遣計劃的書翰

一五八八年加藤清正被封為肥後國北部的領主。他與同時成為肥後南部領主的小西行長一同，為秀吉侵略朝鮮打頭陣。一五九二（文祿元・萬曆二十）年四月，開始侵略朝鮮後，加藤清正率領一萬軍兵在釜山登陸。五月初，清正的軍隊佔領首爾，接著進攻鹹鏡道。可是次年一五九三（文祿二・萬曆二一）年一月，明朝的援軍奪回了平壤，逼近首爾。二月末，清正也從鹹鏡道撤退到首爾，在該時，他的兵力從一萬人減少到不足五千五百人（北島 1995:34-138；北島 2007: 8-51）。四月，日本軍從首爾撤退到釜山附近，其後在朝鮮南岸一帶建築城塞駐紮。清正在釜山北方的西生浦築城，由於長期侵略，武器、軍需品、軍糧消耗嚴重，清正屢屢要求留在肥後的家老們籌集大量的必需物資送至朝鮮（北島 2007:80-88）。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清正向肥後的家老們發出一封派遣「唐船」計劃的下述書翰。

一、派遣唐船時，關於付搭船費乘船的商人，由於是（清正的）派遣船，命令他們全部乘坐在同一艘上。

一、用於購置進口物品的銀，要如以前指示的那樣準備好。此外，凡可用於交易的貨物都要準備好。

一、用於交易者以小麥粉為最好，因此指示在自己的船上裝小麥粉二十萬斤。由於同船的町人們比較熟悉，向他們打聽小麥粉製法，向農民徵收，一定要籌集到二十萬斤。

一、如曾指示「四郎兵衛」那樣，「勘兵衛」或「甚七郎」兩人之中，派遣一人。…

一、派船時，對「くろほう」、「又大夫」（在渡航中），好好照顧其妻兒。

一、發給「又大夫」米七十石\*、大豆三十石。

一、發給「までやす」米五十石、豆二十石。……（下略）<sup>1</sup>

該書翰是記述十六世紀末九州大名海外貿易實際狀況的珍貴史料，但雖具體記載了唐船的乘船者和出口貨物，但航行目的地與進口貨物不明。

首先根據森山恆雄先生的考証說明一下唐船的乘船者與出口貨物。「唐船」的乘船候選人中，「甚七郎」不詳，「勘兵衛」是指肥後北部的的主要港口伊倉的代官後藤勘兵衛，可認為他統管乘坐該唐船的肥後商人們，是執行清正所希望的貿易的負責人。第五條、第六條的「又大夫」也不清楚，但由於發給了大量米、大豆，應也是航海負責人之一吧。第五條中的「くろほう」(kurohou)也不清楚，當時日本稱黑人為「くろぼう」(kurobou)，因此有可能是南洋方面的人。第七條的「までやす」(mateyasu)，可認為是一名叫 Mateus 的歐洲人，或日本人基督教徒。對「までやす」也發給了大量米、豆，可以推測他是負責與歐洲人進行貿易交涉者（森山 1983:215-217）。

接著來看一看出口貨物。首先在第二條中命令準備銀。該銀可認為是在大坂等米市上出售年貢米而獲得的。並且在第三條中，命令裝載多達二十萬斤的大量小麥粉。加藤清正的領地有很多旱田，小麥為主要作物之一。不過小麥在日本國內難以換取貨幣，因此希望出口到海外市場。清正將小麥作為年貢，並且年貢米中的未繳納部分以麥替代繳納，獲得了大量小麥，並將領地內生產的小麥之相當部分用於裝載「唐船」（森山 1983:214-215）。

總之，清正籌劃在唐船上裝載小麥粉二十萬斤與銀，派遣伊倉代官後藤勘兵衛為交易負責人，以「までやす」為與歐洲人交涉的負責人，並使肥後的商人也同船。從該「唐船」預定裝載小麥二十萬斤來看，是載重千石以上的大型中國帆船(戎克)。一五九六年，清正指示將此唐船以合理的價格出售，由此可知它是清正自己所有的船<sup>2</sup>。在十六世紀末的九州—呂宋貿易中理所當然（中島 2007:71-75），在十七世紀的朱印船貿易中航海仍較多依靠華人舵手（岩生 1985:245-245），該唐船也很可能是由華人操縱的。並且不僅肥後商人，華人商人也可能同乘坐該唐船，但在史料上未得到證實。

二 一五九三年的唐船派遣計劃（一）：預定航行目的地、預定出口貨物

那麼，一五九三年的清正書翰中唐船的航行目的地為何處？關於該問題，森本恆雄氏先生推測，清正派遣該唐船到長崎，計劃購買從呂宋進口的鉛等軍需物質（森山 1983:214）。當時，日本的小麥粉是對呂宋最主要的出口貨物（中島 2007:65-71）。在澳門，由於從中國大陸進口小麥，對於日本小麥需求不多。與此相對，在西班牙領菲律賓，從新大陸輸入大量銀，因此對於日本銀的需求不如澳門那麼高，倒是對作為西班牙人主食的小麥之需求相當大。因此清正的唐船裝載的小麥也無疑運往呂宋市場。

不過，清正派遣唐船到長崎，向從呂宋渡海而來的商船出售小麥，進口鉛等的森本先生的這一推斷值得商榷。首先，唐船通常較之國內沿岸航海，更多用於外洋航海。鄭舜功《籌海圖編》中有如下敘述。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容一二

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沉。……其船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蕩櫓，不能轉舵。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建沿海奸民買船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sup>3</sup>。

並且，一五九三年左右出版的李言恭《日本考》中也有如下記載。

常有唐人用幾千金令精巧木匠造至大之船，名曰船主。但各國客商下海通番，有本銀一萬，先償船價二千。<sup>4</sup>

加藤清正派遣的唐船也可認為是這樣的由華人海商建造的大型戎克。從肥後至長崎的航海是通過水深較淺的內海的沿岸航海，在航海技術上來說，較使用喫水線較深的唐船，使用喫水線淺的日本船應該更為合理。正如下文所述，清正在一五九六（文祿五・萬曆二四）年也曾計劃將領地內的小麥出口到長崎與呂宋兩地，在那時也向呂宋派遣了唐船，派後藤勘兵衛同船。

恰好一五九〇年代初葉為日本—呂宋貿易擴大時期。可以證實，從一五七〇年代起，日本船就航行到呂宋，出口日本銀，購入菲律賓產的金與中國產的生絲。可是其後，在呂宋新大陸銀的進口增加，西班牙人的人口增多起來，因此日本船從銀轉為更多出口小麥。而同時在該時期，日本海盜常常襲擊呂宋島北岸。可是在一五八六年，長崎的大村氏向呂宋派遣貿易船出口了小麥等，其後在九州與呂宋之間，持續進行和平交易，每年一、二艘日本船航行到馬尼拉（岡本 1936；岩生 1966:275-282；中島 2007:65-71）。

可是在一五九一年，受常常渡海到呂宋的海商原田喜右衛門唆使，豐臣秀吉向菲律賓總督遞交了要求其服從日本的國書。該國書恰好在開始侵略朝鮮的九二年四月抵達馬尼拉，菲律賓總督為打探秀吉的真實意圖，向日本派遣了使節。該使節在肥前國名護屋城與秀吉會面後，與原田喜右衛門一起踏上歸國之途，但使節乘坐的船途中遇難，只有原田乘坐的船於次年九三年三月進入馬尼拉港。因此總督派遣佛朗西斯科會士 Bautista，作為第二次使節赴日本。Bautista 在名護屋與秀吉會面，其後赴京都傳教（松田 1992:133-218；Pastells 1994:26-102）。

清正建立唐船派遣計劃是在其後不久的九三年十二月，儘管外交關係緊張，該時期九州—呂宋貿易也很活躍。例如在九二年三月，裝載小麥粉三百 pico (1pico ≒ 60kg) 的日本船從平戶啓航，進入馬尼拉港。該商船的船長證實，在平戶有日本船一艘，在薩摩的阿久根有日本船一艘，在久志有中國船一艘停泊著，裝載小麥粉與武器開往馬尼拉（中島 2007:76-77）。並且在九三年十月，耶蘇會巡察使 Valignano 也報告說：「通常每年有日本人自己的船二、三艘從日本渡海來到比律賓，帶來餅乾、小麥粉、牛肉及其他食品等。這樣日本人得以收取薄利，並且卡斯蒂利亞(Castilla)人等在菲律賓由於這些物品短缺很高興」（高瀨 1981:105）。就這樣在一五九〇年代前半期，日本人與華人的商船從九州頻繁向呂宋出口小麥粉，清正大約也試圖派遣自己的唐船，介入該貿易。

### 三 一五九三年的唐船派遣計劃（二）：預定進口貨物

清正向呂宋派遣唐船，出口小麥粉與銀的話，希望以此進口什麼樣的貨物呢？在上述清正書翰中，沒有關於進口貨物的指示，森本先生推測他試圖在長崎購置從呂宋進口的鉛等軍需品。確實當時清正急需的物資為軍需品。日本軍在侵略朝鮮時，最主要的戰鬥力為鐵砲隊，為了維持戰鬥力，固定供給數量龐大的炮彈與火藥等消耗品是必不可缺的。炮彈的原材料為鉛，火藥的原料為硫黃與硝石。其中硫黃在九州各地出產，但鉛與天然硝石不得不依賴於海外進口（岡田 1939:18-21；岩生 1985:15-17；太田 2002:310-389）。

在一五九一年八月，加藤清正已經為準備侵略朝鮮，下令向長崎等地送銀，從海外船處購買一萬到二萬斤鉛<sup>5</sup>。可是到了日本軍開始在朝鮮南岸駐紮的九三年夏季，清正軍的炮彈與火藥幾乎耗盡。其中硝石可以煎熬含氮成份很高的地板下的土來人工製造（岡田 1939:18-19）。九三年八月，清正在西生浦築城之際，要求將武器、軍糧、軍需品、士兵、工匠等火速送至朝鮮，其中，命令熊本、高瀨、河尻的町家製造、供給硝石<sup>6</sup>。可是鉛與天然硝石完全依賴於海外進口。

這些軍需品是通過怎樣的渠道供應日本市場的呢？明朝本來嚴禁出口軍需品到海外<sup>7</sup>。在一五六〇年代末，解除華人海商從福建海澄縣渡海到東南亞禁令時，寫道：「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sup>8</sup>。並且在一五九二年日本開始侵略朝鮮後，明朝再次全面禁止海商的海外航行。次年九三年，福建巡撫許孚遠上奏要求重新開始海外航行，在其中他指出儘管進行了全面性海禁，但鉛與硝石通過下述渠道走私到日本。

鉛、硝等貨，接濟倭夷，其途非一。在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裝販最多。又有姦商在長蘆、興濟等處，豫行匿載，取便過倭。竝宜一體說法嚴禁。若異國之柬埔寨，多產鉛、硝，暹羅亦有之。倭奴每年歲發船，至交趾、呂宋地方，買運而去<sup>9</sup>。

並且遵許孚遠之命，從九三年七月到九四年一月逗留在九州，偵探日本情況的泉州海商許豫如下報告。

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每年至長岐，賣買裝載禁鉛、白絲、扣線、紅木、金物等貨。…器械不過黃硝、烏鉛為害。硫黃係日本產出，焰硝隨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乃大明所出。有廣東香山澳發船，往他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sup>10</sup>。

並且根據馬尼拉的軍需品備蓄庫的出納帳簿，一五九五年以後，幾乎每年有數名日本人商人入納火藥與硝石（Gil 2000:50-53; 66-68; 76-83）。即從中國走私與國內製造而籌集到的硝石，如有剩餘也出口到馬尼拉。

而鉛不得不完全依賴於進口貨。最大的供給者，正如許孚遠也提到的那樣，是從澳門渡海到長崎的葡萄牙船。根據一六〇〇年左右的葡萄牙船出口貨物清單，兩千 pico 的鉛從澳門出口到長崎，其價格在澳門為一 pico 三兩，在長崎為六兩四分。並且，該出口品清單中沒有硝石（Boxer 1959:179-181）。此外一般認為華人走私者也向長崎與平戶供應了鉛。不過在九三年左右的長崎，侵略朝鮮帶來的龐大的鉛與硝石的需求，理應造成鉛、硝石的價格高騰。在這一狀況中，為確保軍需品，清正向呂宋派遣唐船，大約一是直接進口鉛等軍需品，另一是

將通過呂宋貿易獲得的利益，在國內市場充當購買武器、軍需品、軍糧等的資金。

實際上，在一九九三年前後，出現了呂宋貿易熱。上述的許豫如下敘述了九三年冬左右的狀況。

薩摩州乃各處船艘慣泊之處，今從此發有呂宋船肆艘，交趾船參艘，柬埔寨船壹艘、佛郎機船貳艘，興販出沒，此為咽喉也<sup>11</sup>。

並且於九四年七月，被流放到薩摩的近衛信尹在薩摩的山川港參觀了從呂宋航海歸來的唐船<sup>12</sup>。特別是從九三年左右起，從呂宋進口的中國古壺（所謂「呂宋壺」）在日本極為流行。九四年眾多商人渡海到呂宋，將以相當廉價購買的呂宋壺進口到日本以非常昂貴的價格出售（岸野 1972）。

清正將在領地內徵收的小麥粉出口到呂宋，進口金、砂糖、胡椒、鹿皮、呂宋壺等商品的話，當然會獲得巨大利益。他的領地的財政是僅由從農民手中徵收的年貢來支撐的。可以認為，他試圖將年貢中在國內難以實現商品化的小麥，以唐船運到呂宋，在當地直接購置軍需品，或將此貿易利潤用於在國內市場籌集軍需品。不過該派遣唐船計劃是否付諸實踐，由於完全不存在其他相關史料而無法證實。

#### 四 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向呂宋派遣唐船計劃

一五九三年十二月，清正指示派遣唐船計劃後，駐紮在朝鮮的清正的軍隊仍持續苦於鉛與硝石之匱乏。九四年二月，清正向肥後的家老發出了如下書翰。

對於塩硝與火藥，去年以來多次指示，至今為何仍未送來塩硝五百斤。怠慢至極。如上所指示，在當地調製火藥，因此該書翰到達後，至少將塩硝五、六千斤，如去年指示的那樣，與硫黃一起一定要送到。鉛也按比例送來<sup>13</sup>。

接著在二月二十一日的書翰中也命令：「鉛完全沒有送到。去年只送來一次。按與火藥相當的量，送來鉛」（藤原 1998:45-50）。並且在四月也命令：「如以前所指示，籌集鉛與塩硝。送來塩硝千斤，則送來鉛二千斤，為塩硝的兩倍」<sup>14</sup>。而同時在三月還指示：「自去年起，屢屢使年貢米的未繳納部分以小麥入納。……在去年指示的小麥等外，由於必需小麥，盡一切手段予以徵收」<sup>15</sup>。如果九三年十二月果真實現了派遣唐船計劃，理應將此時徵收的春小麥磨成粉，利用秋季的季風運到呂宋。不過此前後的清正的書翰幾乎都沒有留存下來，其後經過不明。

九四年至九五年，清正駐紮在西生浦，繼續與朝鮮方面談判議和。可是強硬主戰的清正與推動議和的小西行長之間對立日益嚴重，於九六年四月以破壞和議而被追究責任，被召回日本，五月於京都近郊的伏見蟄居（北島 2007:132-138）。在伏見蟄居時，清正再次計劃向呂宋派遣唐船。關於該計劃，留下了數件相關史料，已經由森山恆雄先生進行了詳盡探討（森山 1966；森山 1983:204-207; 218-231）。在此也根據森山先生的研究概述其梗概。

九六年七月，清正為了獲得渡海到呂宋所必需的秀吉的朱印狀，將文稿拿到負責寫作豐臣政權外交文件的西笑承兌處，得到了按上秀吉印的朱印狀<sup>16</sup>。這之後，於閏七月十五日，清

正如下命令領地的財政負責人。

一、以唐船裝載小麥，並且除貸與原田喜右衛門者外，其剩餘者在與原田磋商後出售。以該小麥，以及其他夏季的收穫物作為交換，從南蠻船購買鉛。應派一直負責購買者購買。此外，預定好從南蠻船購買之貨物。

一、來年春向呂宋派遣唐船。為此，派遣後藤勘兵衛、町人豬右衛門，故予以通告<sup>17</sup>。在此，清正下令將該年徵收的小麥按下述三種方法處理。(1)向原田喜右衛門貸與小麥。(2)與原田磋商，在長崎等地向南蠻船出售小麥等，購入鉛。(3)在唐船上裝載小麥，派往呂宋出售。

原田喜右衛門是如上所述，唆使秀吉向呂宋派遣使節，並於九三年自己作為使節渡海到馬尼拉者。並且，原田與秀吉的側近伏見的代官長谷川宗仁相結合，開始總攬與菲律賓的所有貿易事物（箭內 1998:4-10）。九五年二月，Baptista 向菲律賓總督遞交的書簡上提到：「現在國王(秀吉)以死罪禁止原田（喜右衛門）與法眼(長谷川宗仁)以外的人帶入（呂宋）壺，對他們，給予監督赴馬尼拉的船舶用的朱印狀，沒有他們的許可，任何人不得航行」（岸野 1972:150-151）。

原來在長崎開展的與葡萄牙船的貿易與耶蘇會方面的關係較深，與長崎、博多商人交往的小西行長等信基督教的大名處於有利的地位。特別是與行長和耶蘇會處於對立關係中的清正，在摸索如何在行長與長崎、博多商人的影響力很強的，在長崎展開的對葡萄牙貿易之外另闢蹊徑介入海外貿易。於是，他一方面關注與呂宋西班牙人的直接貿易，另一方面試圖獲得葡萄牙人與華人的商船向長崎、平戶供應的軍需品。因此，他與在秀吉政權下勢力上升的長谷川與原田新勢力相結合，試圖介入他們總攬的呂宋貿易。

可是九六年八月末，秀吉沒收了漂流到土佐的西班牙船 San Felipe 號的貨物，並且加強了對菲律賓方面傳教士的彈壓，日菲關係遽然緊張起來（松田 1992:219-280）。並且在九月初，日明媾和交涉破裂，秀吉命令諸大名準備向朝鮮再次出兵（北島 1995:173-179）。在這樣的政治狀況的變動中，清正仍推進與菲律賓貿易的計劃。他寫下了日期為十月十五日的遞交菲律賓總督的書翰，要求菲律賓當局為航行到菲律賓的他的「領民之船」提供方便<sup>18</sup>。並且次年一五九七（慶長二）年正月三日，清正指示家老，如果情況不允許，不得已向呂宋派遣唐船的計劃斷念，但向日本人耶蘇會士 Vicente 詢問情況，如估計不會彈壓基督教徒，則實施派遣唐船計劃<sup>19</sup>。

可是，正月十四日，秀吉在長崎將 Baptista 等弗朗西斯科會士以及日本信徒處刑（松田 1992:281-293；Pastells 1994: 104-146）。森山先生推測因此清正放棄了向呂宋派遣唐船的計劃（森山 1966:775-777；森山 1988:222-223）。不過該年四月，實際上日本船航行到馬尼拉，遞交了上述清正寫給菲律賓總督的書簡，總督將此書翰與譯文呈交西班牙國王（Gil 2004:60-61）。該日本船即為清正書翰中提到的「領民之船」，但也有可能實際上它是九六年十二月清正下令派遣的唐船。如果四月末進入馬尼拉港的日本船是清正派遣的唐船的話，大約是三一四月裝載春季小麥由肥後出航，五月左右順著季風航行回到日本。不過清正在該年九月說：「關於唐船，如有適當的買者即出售。不得廉價出售」，發出了出售唐船的命令<sup>20</sup>，在該時，他對唐船貿易暫時斷了念頭。

### 結語——加藤清正與福建海商的網絡

在以上本報告中，重新探討了一五九三年、九六年加藤清正策劃的派遣唐船計劃。十六世紀末期的九州—呂宋貿易，是華人、日本人海商，主要使用華人建造、操縱的中國式戎克進行的。在當時呂宋，有近兩萬人的華人航行而來並居留，他們中的一部分並且參加了呂宋—九州貿易，並且破明朝的禁令，從福建直接渡海到九州的海商也不在少數。這樣在十六世紀末期，作為東亞海上貿易大動脈的福建—呂宋貿易之支線，形成了連接福建—呂宋—九州的一種三角貿易渠道（中島 2007）。可以認為清正的呂宋貿易計劃也是以利用這一福建海商貿易網絡的方式而構想的。

在十七世紀初葉，顯示清正與福建海商之間關係的史料日益增多。首先一六〇二（慶長七・萬曆三十）年，清正以福建人王天佑為翻譯，將華人俘虜八十七名送還福建<sup>21</sup>。開始朱印船貿易的一六〇四（慶長九）年，清正建造了全長三六米、寬九米的大船<sup>22</sup>（岩生 1985:133-134），該大船其後大約作為朱印船使用。清正於一六〇七（慶長十二）年獲得了與西洋（東南亞西部），於次年〇九（慶長十四）年獲得了與暹羅、交趾的朱印狀，實施了朱印船貿易<sup>23</sup>。其中〇九年開往暹羅的朱印船船長是名為林右的華人海商，為避暹羅之亂，於交趾寄航，進行貿易，交趾（廣南國）的阮氏委託林右帶給清正書簡，要求繼續開展貿易<sup>24</sup>。

並且清正還相當積極開展與航行到肥後的福建海商之間的貿易。一艘華人商船在開入熊本海面時，清正按照華人的希望，使唐船回航到肥後北部的高瀨港，同時清正命令不得卸貨和不讓乘船者上陸，編制船上貨物清單，向德川政權匯報<sup>25</sup>。並且在肥後似乎居住著不少華人。在熊本的城下町，沿著坪井川的碼頭形成了「唐人町」（內山 2005:133-138）。在肥後北部的伊倉港，也沿著菊地川的碼頭建起了「唐人町」（宮本 2006:86-91；內山 2005:1130-1133）。並且可以證實，一位名為清官的華人為清正進行了進出口貨物的交易<sup>26</sup>，一六一一（慶長十六）年清正去世時也有唐人前來弔唁<sup>27</sup>。

特別是在伊倉港週邊殘留著三座明人墓碑。其中林均吾為福建漳州府龍溪縣人，其墓碑建立於一六二一（元和七）年（森山・村上 2005:490）。並且郭濱沂為漳州府海澄縣三都龍溪縣人，其墓碑建立於一六一九（元和五）年。據說他是富裕的華人商人，其墓為典型的福建南部樣式，在當地被稱為「四位官之墓」。可以認為勢力雄厚的朱印船貿易商「肥後四官」或許正是這位郭濱沂。「肥後四官」的朱印船於一六一七、一八（元和三、四）年航行到交趾，博多的豪商島井家、堺商人向他的交趾貿易投資，英國人 William Adams、Edmund Sayer 也作為舵手與商務人員乘坐了他的朱印船（森山・村上 2005:488-490）。

這樣在十七世紀初葉，不少華人海商航行來到肥後，在伊倉與熊本也出現了「唐人町」。可以認為他們大多如郭濱沂與林均吾那樣，是漳州府等福建南部地區人。從一五六〇年代末起，眾多福建海商航行到東南亞各地，特別是呂宋，並且從呂宋與福建還航行到九州。可以認為一五九二、九七年，清正計劃的派遣唐船到呂宋，大約也是基於福建海商的貿易網絡而策劃的。

## 參考書目

- 石井謙治 1957:『日本の船』創元社
- 岩生成一 1966『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岩波書店
- 岩生成一 1972:「日本南方諸国往復書簡 補遺」『南島史学』創刊号
- 岩生成一 1985:『新版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岩波書店
- 内山幹生 2005:「熊本市・人吉他」『海路』2(特集:九州の唐人町)
- 太田弘毅 2002:『倭寇——商業・軍事史的研究』春風社
- 岡田章雄 1939:「近世初期に於ける主要なる輸入物資について」『岡田章雄著作集』3(思文閣、1983)所収
- 岡本良知 1936:「一五九〇年以前に於ける日本フィリピン間の交通と貿易」『キリシタンの時代』(八木書店、1987)所収
- 岸野久 1972:「「るすん壺」貿易の歴史的役割」『キリシタン研究』17
- 北島万次 1995:『豊臣秀吉の朝鮮侵略』吉川弘文館
- 北島万次 2007:『加藤清正——朝鮮侵略の実像——』吉川弘文館
- 高瀬弘一郎 1981:『イエズス会と日本1』岩波書店
- 中島楽章 2007:「十六世紀末の福建—フィリピン—九州貿易」『史淵』144
- 藤原秀之 1998:「加藤清正朝鮮陣書状について」『早稲田大学図書館紀要』45
- 松田毅一 1994:『豊臣秀吉と南蛮人』朝文社
- 宮本雅明 2006:「日本型港町の成立と交易」『港町のトポグラフィ』青木書店
- 森山恒雄 1966:「豊臣氏海外貿易の一形態」『地域史研究と歴史教育:森山恒雄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熊本出版文化会館、1998)所収
- 森山恒雄 1983:「豊臣氏海外貿易の一形態続論——肥後加藤氏関係の新出史料の紹介をかねて——」、箭内健次編『鎖国日本と国際交流』上巻、吉川弘文館
- 森山恒雄・村上晶子 2005:「加藤政権の支配」『玉名市史』通史編・上巻、玉名市
- 箭内健次 1998:「近世初頭の堺貿易商人と統一政権」『国際社会の形成と近世日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
- フアン・ヒル(Juan Gil) 2000:『イダルゴとサムライ 16・17世紀のイスパニアと日本』(平山篤子訳)法政大学出版局
- パブロ・パステルス(Pabro Pastells) 1994:『16-17世紀 日本・スペイン交渉史』(松田毅一訳)大修館書店
- Boxer, Charles R. 1959: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

- 1 個人所藏文書。引自森山 1983:208-209。
- 2 渡邊翠峰所藏文書。參見森山 1966:776。
- 3 鄭舜功《籌海圖編》(中華書局,2007年)卷2,倭國事略:201-202,倭船。參見石井 1957:142-144。
- 4 李言恭《日本考》(中華書局,2000年)卷3:28-29,〈出海通番〉。
- 5 澀澤榮一氏所藏文書,《新熊本市史・史料編3・近世I》(熊本市,1994年):25-28。
- 6 原富太郎氏所藏文書,《新熊本市史・史料編3》:37-38。
- 7 《大明律》卷16,兵律,關津,〈違禁下海〉。
- 8 許孚遠《敬和堂集》(萬曆22年序刊本)疏,〈疏通海禁疏〉:26a。
- 9 許孚遠《敬和堂集》疏,〈疏通海禁疏〉:28a-b 請計處倭酋疏。
- 10 許孚遠《敬和堂集》疏,〈請計處倭酋疏〉:75a。
- 11 許孚遠《敬和堂集》疏,〈請計處倭酋疏〉:74b。
- 12 近衛信尹《三藐院記》文祿三年五月十九日條。
- 13 下川文書,《新熊本市史・史料編3》:51-52。
- 14 武井友貞氏所藏文書,《新熊本市史・史料編3》:56-62。
- 15 速見真曹氏所藏文書,《新熊本市史・史料編3》:54-56。
- 16 山城等持院文書。參見森山 1966:748。
- 17 大阪城天守閣所藏文書,《新熊本市史・史料編3》:67-68。
- 18 「加藤清正よりフィリピン諸島長官に贈りし書翰」,村上直次郎編譯《異國往復書翰集》(雄松堂書店,1929年):82-84。
- 19 群馬縣立博物館所藏文書。引自森山 1983:209-210。
- 20 渡邊翠峰氏所藏文書。參見森山 1966:776。
- 21 《神宗實錄》卷371,萬曆三十年四月癸卯條。
- 22 舟橋秀賢《慶長日件錄》慶長九年四月十六日條。參見
- 23 《增訂異國日記抄》(雄松堂書店,1929年)附錄:291;330;305。
- 24 肥後本妙寺文書。參見岩生 1972:75。
- 25 群馬縣立博物館所藏文書。參見森山 1983:211。
- 26 山口貞記氏所藏文書。參見森山 1983:211-212。
- 27 山口縣文書館所藏文書,《新熊本市史・史料編3》:86-90。